



加强自身建设

奠定思想基础

1942年春,遵照党中央指示,山西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整风运动。晋绥八分区处于抗战的最前线,战事紧张、频繁,整风只能在战役战斗的间隙进行,时间延续较长,结束时间较晚。古交市岔口乡关头村的观音堂,即为当时关头整风所在地。

1943年8月,按照晋绥八分区总学习委员会《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的要求,先从分区一级各机关干部开始整风学习。为适应特殊情况,晋绥八分区坚持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领导与民主、整风与工作相结合,为分区整风运动的全面开展积累经验。

1944年2月1日开始,晋绥八分区地委举办了整风学习班。集中参加整风和审查运动的干部以在职工部训练队(以下简称干训队)为形式,在行政上设立一个队部,用以管理学习班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行动,队部下共设五个分队,各分队根据实际情况分设五至七个班,每班学员七人至十人。班成员的分属则按照学员所在地区或所属系统编制。

整风学习班深入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批评,写出思想小传和历史小传,确定努力的方向。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每个干部经过审查,作出政治历史结论。

晋绥八分区紧密联系对敌斗争前沿的实际,把“对敌斗争”思想作为重要内容学习讨论,每一位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撰写反省材料,坚持正面教育为主,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思想问题。

整风运动后期,晋绥八分区在审干过程中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广大干部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查清或基本查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1944年冬,审干工作结束后,除个别干部调整了工作外,绝大多数干部仍回原单位任职。

在晋绥八分区集中学习会上,三位家庭出身不同的学员代表先后发言,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部分同志都针对自己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作风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对照检查,并找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头整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晋绥八分区在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党委领导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次集中行动。通过整风运动,加强了学风、党风、文风建设,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古往今来呼延村

郝岳才



汾河出峡后,西岸边有一村名唤呼延,西靠崛山、东临汾河,是太原西北部第一大村。

关于呼延村的历史,民间口耳相传,村名与匈奴呼衍氏相关。《元和姓纂》与《姓氏寻源》均记载,匈奴氏族有呼衍氏,入中原改为呼延氏。东汉末年至曹魏,南匈奴沿黄河南下融入中原,呼衍氏一支迁居于崛山下,形成呼延聚落。

《元一统志》记述:“呼延社,在阳曲西北,元魏时部落之地也。”隋道光《阳曲县志》记述:“正西乡呼延一都共四村,呼延村距城三十里,有多福寺、崛山寺、永善桥。”“呼延村崛山寺,在崛山下,唐贞元二年(786)建,赐额曰‘三教堂’。山上有多福寺,即古崛山寺教。明弘治改多福,而山下寺遂专崛山名矣。嘉靖万历间重修,有碑记。旧志,晋王李克用与子存勗焚香题名,刻石于此,即山上寺也。”清道光《阳曲县志》记载:“勇堡,南北二门,在呼



太原的店头村之所以称为“古堡”,是因为这里曾是拱卫晋阳城的军事堡垒之一。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的匈奴人刘渊在晋西北建立汉国,并州境内汉人避祸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公元306年,为了抗击匈奴,保卫洛阳,36岁的并州刺史刘琨赴晋阳上任。

公元307年,刘琨冲破匈奴的重重障碍,到达晋阳。当时,整个并州已经剩不下两万户,晋阳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城,东西南北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在敌人包围圈内生存下去,刘琨克服重重困难,于废墟中重建晋阳城。就在晋阳渐渐恢复生气时,刘渊派出五万匈奴包围困晋阳。

当时,刘琨兵力只有几千人。在外无援军、内缺粮草的困境下,刘琨在城头凭借一曲《胡笳五弄》,让匈奴兵军心崩溃,仅仅围城七天就撤退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来势汹汹的匈奴有了战厌之情?

如果想拿下晋阳城,须从西山风峪沟进兵,一旦进入风峪沟,晋阳城一望无遗。因此,刘琨若想守住晋阳,必须将前线推至风峪口。

从晋阳城进入风峪沟,第一个村落就是店头村。

店头背靠蒙山,沿风峪沟东行约千米,一排排别具一格的石窟洞窟随着山势层叠而上,呈楼台式分布。

窑洞不只外部形态独特,内部结构也很特殊。房屋都很大,空间开阔,窑洞与窑洞之间,互相连通,每层之间有暗道和楼梯相连,外面看好像是独立的窑洞,里面由暗

道相互串联起来,使得整个建筑群的内部四通八达。

古地理、军事专家李新禾、谢鸿喜两位教授在《千年古村——店头巡礼》一文中,提到店头古堡“属于事前曾统筹设计、规划的官修兵营、防卫工事、军事要塞……是从晋永嘉元年至建兴四年(307—316)晋并州刺史刘琨抗击赵刘渊父子所建……”

1700多年以前,这种以石窑洞加地道统筹设计的军事要塞,其作用是什么呢?

《雍正·太原县志》记载:“风峪山,县西十里,路入交城、娄烦。唐北都西门之驿路也。”说明风峪沟在唐代是晋阳连接晋西和晋西北直至陕甘等地的重要通道。这也是刘琨在店头构筑要塞而重兵扼守的主要原因。

店头作为军事要塞,主要是起警戒、报信、拖延对方的作用,给晋阳城的守卫争取时间,因此驻兵不会太多。如果刘渊大部队到来,驻守在这里的军士怎样将古堡的功能和效应发挥到最大?

店头紫竹林北面山路旁,有地道口,曾是通往村后蒙山寨的地道。多年未使用,淤积严重。村民在清理古堡的过程中,在几座窑洞里发现了通往后山的地道,坍塌的地道阻塞了去路,也掩盖了无数秘密。

距离店头约千米,还有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程家峪村。村里以石头窑洞为主。这些古老的窑洞里共发现了八处地道口,每个地道都能与中部对接互通,有的地道内还有马厩。这些地道是唐朝时与村落同时建造的,具有军事用途。在入村的崖壁上,有一处离地面很高的

地道口,这是一个瞭望口。当时的村里人可以通过地道来到此处,观望路过的崖下道路上的行人。

一个战略要冲,两处具有军事性质的村落,相互之间有没有地道相连?即使没有连通,但互为掎角,这两个军事性质的村落有相互支援和救护的可能。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在匈奴大军直扑晋阳时,店头古堡这支前锋部队开始示警,并且开始袭扰侵军。在达到“警戒、报信、拖延对方的作用”后,进入地道转移,落脚在蒙山寨。

据史书记载,刘琨抗击匈奴刘氏兄弟,把他们赶出了晋阳,二刘翻越蒙山逃窜时,又被追到蓝谷大战,匈奴惨败,“伏尸数百里”。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军队来去都是走的风峪沟,店头古堡的守军退守的就是现在位于店头北面的蒙山寨。蒙山寨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使得入侵者不敢轻易投入兵力。当入侵者围攻晋阳城时,这支小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袭击入侵者,使匈奴大军昼夜不安。店头守军对于这样的态势应该是早有预案的,对于袭击的时间、地点、方式都拿捏得很准确,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的同时消耗了敌人,造成了入侵者不能得到休息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入侵者的心灵上产生了不安和厌战。

这样的疲劳战术,才可能使得匈奴军队仅仅七天,就已经接近心理崩溃的边缘,才有可能在听到一点响动时,就“凄然长叹”。若非休息不好,一支有备而来的主力军是不会“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泪歔欷,有怀土之切”的。

上巳、寒食、清明,均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经过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的漫长演变,明清的时候,寒食节、上巳节虽然名称还在,但实际上已经与清明节合二为一。

上巳节俗称“百五日”,即冬至后的第105天。先秦,上巳这一天,男女老幼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是一种清除不祥的仪式,官府还专门设置女巫一职来主持。当天,还会举行招魂避邪祭祀活动,人们编柳圈或者折柳枝带在身上驱邪。

汉代以后,上巳节的祭祀功能消失,变成了纯粹的游玩活动。到了宋代,理学盛行,上巳风俗渐渐衰微。

上巳节的消失,在山西旧志中有所反映。清乾隆《潞安府志》载:“三月三日,俗以此日为祓除,殊失上巳故典。”从旧志记载也可看出,上巳节修禊踏青、曲水流觞等内容,直到20世纪初还被少数文人雅士仿行。民国《灵石县志》载:“三月初三日,为‘上巳’,古人以为修禊踏青令节,迄今文人学士犹有行之者。”

在吕梁、临汾、长治等地区,上巳节的插柳习俗虽然沿袭下来,但已从最初的招魂避邪演绎为更现实的驱虫、避蝎。清康熙《永宁州志》载:“三月三日上巳,以青柳梢作圈插壁,避蝎。”清雍正《石楼县志》载:“三月初三日……上巳,取柳条作圈避蝎。”

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发源于山西。其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介子推。重耳年轻时流亡,在一次饥饿难耐时,随从介子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成肉汤奉其食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割股奉君”。19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晋文公重赏了当初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介子推便携同老母隐居到绵山。重耳遍寻不着,放火烧山逼他出来,介子推宁死不出。后来在他死去的柳树洞里,发现他留下的劝谏耳勤政廉政的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后人感其大义,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另一种说法是源于远古时期的改火旧习。古人为防治火灾,每年初春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熄灭,然后重新钻燧取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这个习俗逐渐演变成了寒食节。寒食节时北方天气寒冷,长达一个月不许举火,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清康熙《解州志》等多志记载:“断火一月,老幼不能耕”“岁多死者”。东汉时,并州刺史周举移风易俗,将寒食压缩为三天。清康熙《汾阳县志》载:“寒食节……禁火三日,谓‘禁烟节’。”后来,寒食节也慢慢演变为祭祖的日子。

在一些旧志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寒食节、上巳节与清明节的融合。如清光绪《荣河县志》载:“清明节,蒸面作大兜鍪状,俗名子推,持以祭墓。”清嘉庆《介休县志》载:“清明,富家设牲醴鼓吹省墓,贫民亦造面饼,如盘蛇状,陈酒醴祭冢,归则曝面饼于棘棘上,俟干而后食,或谓取象龙蛇,寒食之遗也。”清光绪《岢岚州志》载:“清明节……前三日,不举烟火,各备冷食,以遵‘寒食’古风。”民国《翼城县志》载:“三月初三日,为‘上巳’……西北诸乡,以是日迎洁候介子推于小绵山,会场颇盛,士女观者络绎不绝。”

在旧志中,还有大量的关于寒食节的误记,也可以看出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的杂糅痕迹。有的把“上巳节”说成“寒食节”。如清雍正《朔州志》、光绪《怀仁县新志》载:“三月三日,一名‘蟠桃节’……一名‘寒食节’。”有的把“寒食节”与“清明节”混为一谈。如民国《马邑县志》载:“去冬至一百五十日,为寒食,又谓之‘百节’。”即“清明”是也。民国《翼城县志》称:“清明节,一名寒食节。”

有的说寒食节、清明节连续两天都要隆重上坟、祭拜,如民国《新绛县志》称:“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沿门插柳,均食寒面。纸钱、肴馐,聚族墓祭,且加封焉。”民国《临县志》载:“寒食、清明、中元、冬至,家家登坟祭扫,间有置酒食聚族共饮者。”

这些误记与混淆,也是上巳节、寒食节与清明节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杂糅融合的文献佐证。

诗意锦绣太原 (23)

